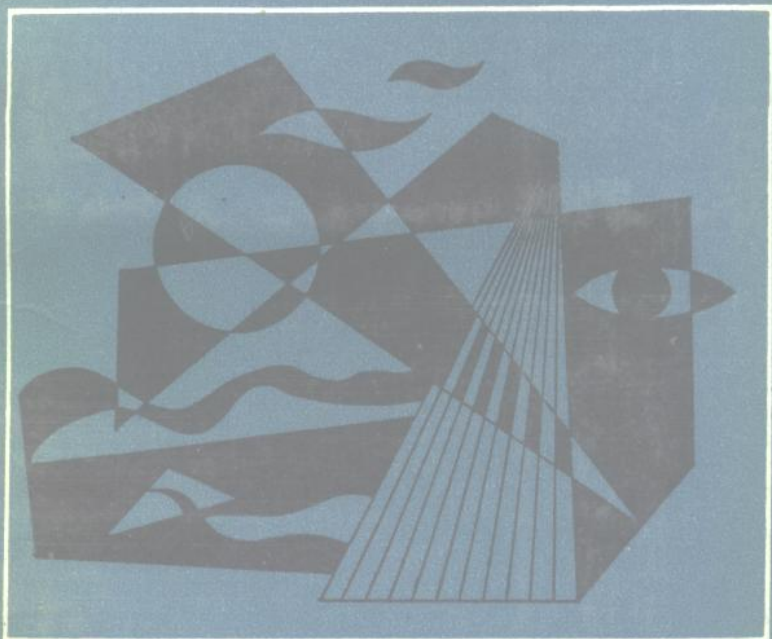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文库

文化唯物主义

〔美〕马文·哈里斯 著

张海洋 王曼萍 译



华夏出版社

C912.4/32

文化唯物主义

WENKU.

〔美〕马文·哈里斯 著

张海洋 王曼萍 译

责任编辑：陈观胜

封面总体设计：郭力 钮初 呼波

李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徐天离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

by

Maruain Harris

Vintage Books, New York, USA., 1989

文化唯物主义

〔美〕马文·哈里森 著

张海洋 王曼萍 译

陈来胜 校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875印张 302千字 插页3

1989年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册

ISBN7—80053—277—1/G·047

定价：5.45元

DI-187/02

译者序言

1986年秋，因组译一本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书去民族学院林耀华先生家拜访，叙谈中提及该书作者时，恰见先生家书架上放有该作者的《文化唯物主义》一书，遂借回翻阅。阅后，感到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有其独到之处，触及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译过来，对于国内建立一个较完整的人类学理论框架可能会提供某种借鉴。于是马上开始组织翻译。

本书作者马文·哈里斯系美国人类学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勤于思考，著述颇丰。他自称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近年来以其“文化唯物主义”观点独树一帜，在美国人类学同行中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代表人物。1968年他的成名之作《人类学理论的兴起》（即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面世时，他的“文化唯物主义”观点已经初具雏形，十年之后，瓜熟蒂落，终于推出了眼前这部雄心勃勃的系统性理论著作。

据作者本人所言，他依据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的一个重要思想，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作者根据这一基本思想而构筑了他的“文化唯物主义”体系的框架，在本书第一部分中，他集中阐述了“文化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理论原则和理论范围，把人类社会生活划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客位行为的基础结构

即生产方式(用于扩大或限制基本生计生产的技能和实践活动,特别是食物和其他形式的能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用于扩大、限制和保持人口数量的技能和实践活动);客位行为的结构,即家庭经济(在宿营地、住宅、公寓或其他家庭住地内组织再生产和基本生产、交换和消费)和政治经济(在群体、村落、酋邦、国家和国内部及相互之间组织再生产、生产和消费);客位行为的上层建筑(艺术、音乐、舞蹈、文学、广告、仪式、户外活动、游戏、业余爱好、科学),思想的和主位的上层建筑(从参与者那里得到的或由观察者推断出来的关于行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认识的目标、范畴、规则、计划、价值观、人生观和信仰)。按照“文化唯物主义”的观点,基础结构因素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支配和决定着其他层次的存在和发展,即客位行为的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决定客位行为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后者又决定行为和思想的主位上层建筑,作者把这一原则名之为基础结构决定论原则。

作者倡导的“文化唯物主义”观点明显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以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异同,而坚决反对到人们头脑里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认知过程中去寻找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起因。因此我们看到,作者在本书第二部分中逐一评述了当今欧美学术界深有影响的几大理论(其中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是错误的),强烈抨击了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极为重视人类再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提及),把这一因素置于基础结构中,认为它对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一再强调经济、技术和生态等因素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

作者虽然高度评价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却批评马克思所讲

的“生产方式”的意义含混不清，并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再生产方式”(即人类再生产)问题，主张以“再生产方式”因素代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作者公开表示，“文化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有相似的理论原则，却持大不相同的认识论，因此他全盘否定辩证法，否定黑格尔的辩证思想。

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番精心改造折射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知识界越来越被马克思主义这块巨大的磁石所吸引，因为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许多研究领域就无法深入下去，尤其在人类学中，撇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繁茂芜杂的现象就无法得到正确的解释。所以，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人类学研究势在必行。本书就是这种大格局下的一个必然产物。毫无疑问，书中所持的一些观点是我们不能赞同的，但是它尝试运用的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毕竟给人类学研究界吹进了一股清风，使人类学中长期以来难以解开的一些谜团有了令人信服的初步解释，而且这些解释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是首尾一致的，是以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为佐证的。对于“文化唯物主义”观点(例如强调基础结构作用和人类再生产作用、区分主位与客位以及把基础结构中的许多成分移于结构和上层建筑之中等观点)，只要我们以客观的态度加以分析和探讨，就能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促进国内人类学的发展。

本书涉及众多的学科和理论，笔者学识浅薄，虽竭尽全力精心校订，仍不免有疏忽误解之处，尚祈专家学者拨冗指正。

国内外知名学者林耀华先生于百忙中为本书中译本撰写前言，谨代表二位译者表示衷心感谢。

陈来胜

1987年10月30日

为中译本所写的前言

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而必须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理顺生产关系，理顺生产关系就要对现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改革需要熟谙国情，而熟谙国情又离不开对本国文化的系统研究。由此可见，文化研究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即两个文明的建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但是，文化现象的关系纷纭复杂，文化研究的内容博大精深，故欲进行此项研究则非有坚实科学的专门学科理论而不能完善其事。然则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对于今日中国文化理论的总体框架和内部结构不可不深思而熟察之。

首先，从高处着眼，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已有正确和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我们以往坚信不疑并深深获益、今后要继续坚持和加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建立科学的文化理论体系的良好前提。循此前进，中国的文化理论体系建设和文化研究必能事半功倍。这是大可乐观的。

其次，从低处着眼，我们的辽阔国土上居住着56个民族。它们各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绚烂多姿的文化，可谓宝库藏珍，万物皆备。这是令人鼓舞的雄厚基础。凡此种种皆为建立中国的文化理论体系的有利条件。

然而，我国文化科学理论框架的建立之中也有薄弱层次，那就

是我们的专门学科的基础理论或曰学科方法论不够厚实，学科规范未臻严谨完善之境，以至于难以达到正确的科学指导思想和具体研究实践的有机结合。这一层次得不到充实，则国内的文化科学研究将如骨鲠在喉，不能得到迅速的发展。长此以往，我们会有愧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并有负于国内知识各界寄予中国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界的厚望。

有鉴于此，近年国内知识界和出版界的有识之士纷纷奋起，著书立说，翻译介绍，使得各种民族学和人类学丛书如雨后春笋，竞相问世。在此背景之下，本书译校者陈来胜等同志以及华夏出版社慧眼独具、知难而进，组织翻译《文化唯物主义》这部理论层次较高、具有学科方法论意义的当代名作，从客观上为建立中国文化科学理论体系的中间层次准备砖石，堪称远见卓识之举。

《文化唯物主义》一书的副标题是“为一门文化科学的斗争”。这个副标题很好地说明了本书的目标所在。至于作者何以要建立一门文化科学，则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史大有关系。

众所周知，近代的民族学，人类学兴起于西方。其近期源头实为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期间西方传教士和探险家介绍异域风情的游记。此等游记逐渐衍成系统，便成了早期的民族志(Ethnography)。到了19世纪中叶，学人借各种民族志进行文化上的比较研究遂发展成民族学(Ethnology)。在欧洲，它同考古学、语言学密切配合，并列而为文化研究的三大支柱。与此配套的还有一门学科叫人类学，专门研究文化的生物学基础，即人类体质特征的遗传进化和人类的种族类型。这一格局在欧洲延用至今。我国的民族学系蔡元培先生本世纪20年代到法德等国考察之后所提倡兴起，故总体框架与欧洲体系接近。但在20世纪的北美，学者们为了全面地研究印第安人的文化，常感有必要将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乃至体质人类学知识集于一身，所以再次提高层次，把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合

为一体,称为文化人类学。它与体质人类学并列而归于人类学之下,实则今日各国民族学工作者也必须接受考古、语言和体质人类学等方面的训练。因此从知识结构上讲,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乃至人类学,都是大致相同的。我们说广义的民族学等于文化人类学或人类学也是以此为立论基础的。然而近年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进一步感到文化诸因素包括技术、经济、法律等,在人类社会中实为浑然一体,密不可分,故尔又一次把层次拨高而打出文化学或曰文化科学的旗号。《文化唯物主义》要为之斗争的文化科学,即是以此为背景的。

就科学发展和人类认识世界的规律而言,从个别、具体到一般、抽象是个客观必然的过程。文化科学的发展自不能逃此公例。况且,学科层次从单一平面向多维框架发展也是令人欣喜的进步现象。但以我个人的一孔之见,民族学或曰文化人类学仍然是文化学或文化科学的基础和核心。通观《文化唯物主义》的论述过程,读者亦能得出这个印象。

本书作者马文·哈里斯是当今美国人类学家的一大方家。这里翻译的《文化唯物主义》是哈里斯氏步入“知天命”之年于1979年写成的一部力作。全书概括了他对社会文化体系的认知框架——即文化唯物主义,其中的第一编即1—4章更是他半生心血的结晶所在。他把社会文化体系分成纵向的三个层次——即基础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又把每个层次都从平面上分出客位行为和主位思想两大范畴。在全书的论述中,哈里斯始终坚持了基础结构对结构和上层建筑、客观行为对主位思想起决定作用的思想,并以此为武器与当前在西方较有影响的几家文化理论学派展开了论战。

持平而论,文化唯物主义中确有不少积极因素。例如,它把人口再生产这一至关重要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中又没有充分展开的命题列入到基础结构里面,使之适得其所,这应该说是充实

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此外,这一理论对社会文化体系所做的3层次2范畴的认知方法也别有心裁,值得我国学者讨论研究,以求探索出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体系的科学认知途径。我们深信读者还会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发现其他有价值的,因而是值得借鉴的东西。这也正是我们要把它推荐给读者的用意所在。

文化唯物主义中的一个致命的,因而是必须指出的消极之处在于它否认了辩证法在唯物论中的地位。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结构和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一积极思想。很显然,我们虽然积极评价马文·哈里斯的这部著作,却无论如何不能全盘接受他的主张,特别不能接受他对于辩证法的指责和他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对于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阉割,因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所提出的“更新观念”、“强化商品经济意识”和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都是依据辩证法的科学原理而进行的。如果全盘接受了哈里斯的技术—经济—环境决定论,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面对基础设施差的现实,岂不就无所作为了吗?

我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既不是要全盘否定文化唯物主义,也不是不相信读者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与此相反,这本书的中译本能够面世这一事实本身就标志着我国在开放改革的环境下所达到的实事求是的程度。但是作为一名老读者,我深感国家的政策越是开放,我们越要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局面,越要想到自己肩头的责任,越要强调严谨科学的态度,越要锻炼自己引进、吸收、消化和创新的能力,进而为建立中国的文化理论体系,为繁荣中国的文化科学研究,为使中国早日建成两个文明和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而努力。

林耀华

1987年11月23日于中央民族学院

目 录

第一部分 作为一种研究策略的 文化唯物主义

导 言	(3)
第 一 章 研究策略和科学的结构	(4)
第 二 章 文化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34)
第 三 章 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	(55)
第 四 章 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范围	(90)

第二部分 其他理论

导 言	(135)
第 五 章 社会生物学和生物还原论	(136)
第 六 章 辩证唯物主义	(162)
第 七 章 结构主义	(191)
第 八 章 结构马克思主义	(254)
第 九 章 心理的和认知的唯心主义	(304)
第 十 章 折衷主义	(338)
第十一章 蒙昧主义	(368)

第 一 部 分

作为一种研究策略 的文化唯物主义

导 言

描述和评价一种研究策略可从两方面进行，因此本书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的一个任务是描述和评价这种策略的基本特征，然后一个任务是描述和评价其他可供选择的策略。

所以，在第一部分里，我力图阐明构成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结构基础的认识论的、理论的原则。同时，我还力图概括地论述一套广泛的互相渗透的理论，以说明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主体的一致性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范围和程度。

另一方面，第二部分论述可供选择的策略。这两个部分都是必要的，因为明智的描述和评价不仅要求我们说明我们为什么赞成某些东西，也要求我们说明为什么反对应予否定的东西。

第一章 研究策略和科学的结构

文化唯物主义是或渴望是一种科学的研究策略,这就是说,文化唯物主义者必须能够为区分科学与其他获取知识的方法和区分一种研究策略与另一种研究策略提供总的准则。我要使这些准则明确,不仅是为了给文化唯物主义下定义,也是为了把文化唯物主义同那些同样声称是科学策略的可供选择的战略加以比较。我们必须了解科学方法的总则。这样,我们就能够进而界定研究策略是什么,并且将各种策略进行比较,以便清楚用哪一种方法能最好地获得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科学知识。因之,关于科学的定义和关于研究策略的定义是文化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

其他认识方法

在提出是什么东西使科学区别于其他认识方法之前,让我说明我对非科学的研究策略的态度。我相信,科学是人类获得有关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知识的一种优越的方法。但是我乐意承认:存在着种种经验的领域,这些领域的知识不能依靠遵循科学方法的规则来获得。我想到了神秘主义者和圣徒的入迷的感知,想到了吸毒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象和幻觉,想到了艺术家、诗人和音乐家的审美的和道德的洞察力。

一个人通过把科学方法的规则运用到日落,或者通过研究在绷紧的琴弦上拉弓后发出的声音,并不能获得关于上帝和热情的

天使的知识,也不能获得关于贝多芬四重奏曲之美妙的知识。科学不争论审美知识的可靠性。同时,我乐意赞同大众的通俗的信念,即认为科学和宗教没有互相冲突的必要。但是必须记住一个附带条件:科学不对天启教的学说提出质疑,只要不用这些学说引起人们对科学本身已取得的知识的可靠性有所怀疑。例如,只要《圣经》还被认为是一种隐喻,那么在有关物种起源问题上,生物学的说法与神学的说法之间就不存在冲突。但是,如果原教旨主义者坚持认为神示的经文比科学,比提供演化知识的科学更可靠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划清一场争论的界限了。

狭义归纳主义

早在16世纪,弗兰西斯·培根就曾提出,科学在于把实验和观察的权威提高到理性、直觉和常规的权威之上。培根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可靠和准确的特殊事实的积累,可以把它们加以分类和概括,结果是有用的“公理”等级不断扩大。这就是他所说的“归纳”的含义。在《新工具》一书中,培根写道:“但是那时,只有在那时,当我们以恰当的上升的阶梯,通过连续而不间断的步骤,从特殊事例上升到较小的公理,再上升到中间的公理,一次次上升,最后达到最普遍的公理,我们才能对科学抱有希望……”^①

虽然很多人现在继续把收集事实和把事实归纳为理论的安排看作是科学方法的中心,然而培根关于事实和理论是什么,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概念,即便在他那个时代里,也绝对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他的准则盛行开来的话,那么最重要的早期科学发现,

① J·斯佩丁R·埃利斯和D·希恩编:《培根全集》,伦敦,朗曼出版公司1875年版,第97页。

例如伽利略有关地球运动的发现，刻卜勒有关行星轨道是椭圆形的发现和后来牛顿有关引力的发现，都将永远不可能产生。

培根决心要避免一切不成熟的推测。他提出，搜集事实应当由没受过教育，并对试验是否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结果不感兴趣的助手来进行。把普通的事实适当地加以整理，就自然会导致对宇宙的某种认识。用科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技巧，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富歪曲性了。培根自己接受了在看来是最普通的事实中存在的谬误。普通的事实显然不会为自己讲话。在培根看来，地球不移动是一个事实，因为人们可以看到地球没有移动；而且在培根看来，生命在自发地产生着，这也是个事实，因为腐烂的肉中总要生出蛆虫，每场雨后总会出现青蛙。

清楚不过的是：单独依靠培根式的事实搜集法是永远也不能达到牛顿、达尔文或马克思的重大突破的。没有理论去指导事实的收集以及区分表面的和有意义的现象，事实总是不会可靠的。

然而我们不当忘记，理论若没有事实，就同样没有意义。培根强调搜集事实，这在当时是一项重要的开端。科学归纳模式，原本是想作为对于使科学探究从属于亚里士多德的直觉的一种矫正措施，也是作为对那些竟用政治和宗教的教条和教义来检验理论的人们的谴责。在培根所处的时代，人们争辩天使的数目，有学问的人可以对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卫星这一事实不予考虑，因为它与既定的理论和原则相抵触。如同天文学家弗朗西斯科·西吉所争辩的：“这些卫星〔木星的卫星〕是肉眼看不见的，因此对地球没有影响，因而是无用的，所以它们就不存在。”^①面对这种异想天开的说法，对于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不应给知识“插上翅膀，宁可给它挂上

① 转引自卡尔·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镇，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65年版，第48页。